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

主编 钱中文 高建平 刘方喜（执行）

开放与恪守

当代文论研究态势之反思

周启超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

开放与恪守

当代文论研究态势之反思

周启超 著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编委会

主 编：钱中文 高建平 刘方喜（执行）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宁 王先霭 王岳川 朱立元 许 明
刘方喜 李西建 金元浦 周 宪
姚文放 高建平 高 楠 党圣元 钱中文
徐 岱 陶东风 曹顺庆 重庆炳 蒋述卓
曾繁仁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与恪守:当代文论研究态势之反思 / 周启超著

—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3. 10

(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 / 钱中文, 高建平主编)

ISBN 978-7-5666-0514-6

I. ①开…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9861号

KAIFANGYUKESHOU



责任编辑: 杨显硕

装帧设计: 陈一刚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开本: 1/16(710mm×1000mm)

字数: 360千字

印张: 19.5

版次: 2013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66-0514-6

定价: 48.00元

总 序

新世纪已经过去 10 多个年头了。我国文学理论在“全球化”、“本土化”语境的热议中，度过了不平凡的 10 多年时光。

在这 10 多年间，文学理论领域几乎和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般，热闹非凡。但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不同的是，这次文学理论是在文学“死亡”，理论“终结”、“危机”、“凋零”的声浪中，不断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与推动，却是论争不断，新说四起。文学理论不断在更新自己，开拓自己的疆域，扩大自身的内涵，展现自己的新形态，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绩。

这时期出现了几种力求有个新面孔的文学理论新编，多种文学理论专题性的著作，出版了有史论结合、规模宏大的 7 卷本《20 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有以专题为主的外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丛书，有以马克思存在论思想出发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有品种繁复的文化诗学丛书，有别开生面的生态文论研究丛书与网络文论丛书，有审美文化理论以及文学人类学这样的新作。这些著作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它们在文学理论、审美文化理论、美学的探索中提出了新思想、新思路，展现了理论的新面貌、新动向。此外还有多种价值取向极为不同的关于新中国成立后 60 年来文学理论史的总结与回顾。可以说，这 10 多年来文学理论的成绩，较之新时期头 20 年，价值取向更趋多元，理论形态更为丰富。

同时我们看到这 10 来年间，不断变幻的外国文化观念大力的输入与引进，一面为我们当今文学理论、美学的建设，提供了不少理论资源，它的反对理论思维的独断性对我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继续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而另一方面在文

学理论改革的正当要求下，也有对于外国批评理论的过度张扬与紧身的跟随，使得文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的探讨，处于变幻不定的状态，而日益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碎片与拼贴，虽然这种情况又是不可避免。面对新的世纪，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这里既有对当下文学理论处境的焦虑与不安，也有对于文学理论未来命运的期待与展望。

但是，无论焦虑与不安，期待与展望，我们理论界需要进行自我反省，自我批判。首先，文学理论需要加强它的实践品格与时代特色，在求新求变中进行理论创新。当今我们已处于网络文化之中，出现了类型多样、形式新颖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包括网络文学在内，而使人目不暇接；而一些文学思潮又使人捉摸不定，目迷五色。人们的文艺活动样式也丰富多样，急速变化。面对今天这样复杂而多样的文学现象、文化现象，文学理论确实相当滞后，身处窘境。文学理论究竟为何、何为？这一问题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出现过多次讨论，至今不失其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创新需要有前沿性的问题感、现实感与时代感，去理解社会的剧变，文学的转型；需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否则文学理论本身就会断了自己的源头活水。正由于这一原因，文学理论常常受到诟病。需要实事求是地去阐明文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形态、新倾向，在理论上给以恰当的概括；提出新观点、新见解，使理论有所发现，有所丰富，有所前进。理论具有预言的功能，但它的常态则是去阐明已经发生的现象，确立相对稳定的规则。这就需要以科学的发展思想为指导，努力去了解中外文学、理论的历史与现状，把握那种高屋建瓴的综合能力。当然，面对当今琳琅满目、形态多样的文学现象，也需要有一个不断认识、消化与积淀的过程。需要时时心向实际，同时又要避免当今相当普遍的急功近利的学风。不要期望文学理论再有“轰动效应”，理论创新绝对不是追求轰动效应，以为不断重复就能引起轰动效应，只会制造理论泡沫。

其次，需要反省我国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本土意识。当今，外国文论的介绍十分普遍，这自然是十分需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要防止那种在介绍外国文论时，实际上介绍者已被外国文论所介绍的现象。外国文学理论中那些优秀的著作，自然具有相对的普遍意义的品格，我们阅读它们时总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本国的文学或是文化渊源相近的文学而展开的。例如 20 世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如此，它们国别不同，出发点各异，所以提出了多种问题。因此如何

进一步建设具有我国民族特色和本土化的文学理论，而不是外国文论的各种拼贴，实在值得我们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本土资源十分丰富，在这方面，不少学者已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建议。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是一个艰苦而细致的过程，这是克服自我与他者异见的过程，是在传统与外来影响的交锋中发现新思想的过程。文学理论提供知识，也提供思想。功力深厚的著作，总是伴随着甘坐冷板凳的决心而产生的，这种良好的学风，已经使得一些学者获得了厚重的学术成果。没有理论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与总结，任由感觉的无选择的泛滥，跟随外国学者之后，拿他们的观点去引领我国文学理论的潮流，极有可能成为各种快餐文化与无选择的理论的狂欢。我们倡导理论的多元化，多元化正是理论繁荣的标志，但是无选择性却是需要克服的。

再次，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也要检验我们的著述，是否具有历史感的品格，真诚与诚信的品格。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文学史，缺乏深刻的历史感，就会失去真诚与诚信，就会缺乏科学性与理论性，而难以取信于人。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历史感就是论从史出，论史并重，就是重视问题产生的现实性，它的历史文化语境、历史生成及其发展，它的历史传统。历史感要求作者的真诚，在实事求是的理论展开中，使其成果获得科学性，进而获得诚信。对于文学史来说，历史感就是尽可能地显示史实，揭示事实的真实面貌，同样需要论从史出，使之史论相映。真诚是学者的一种主观品格，缺乏真诚，就有可能遮蔽历史真相，就有可能利用外力与话语权，歪曲历史，另有所图。这种恶劣作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中极为普遍的生活风习，克服它们，看来工作相当艰巨。当今某些文艺学史著作，看似史作，实则缺乏历史感，让人感到尚未翻过的历史一页，并不是他们写的那个样子。

新时期开始，我与童庆炳教授合作主编过“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出版了36种著作，显示了改革开放后20年间文学理论的实绩的一个方面，后来由于出版原因而不得不中断了。10多年过去，当今文学理论研究的队伍大为壮大，原来的一批中年学者，如今成绩卓著，已经成为文学理论界的主力，撑起了发展文学理论的重任，而一批年青学者，也极富理论发展的潜力。

在这种态势下，河北大学出版社愿意资助“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出版当今活跃在文学理论研究界的老中青各类学者的著作，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自由

讨论、相互切磋、各抒己见的平台，这对于文学论理界来说，真是一大善举，这种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巨大鼓励，必将推动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出版社的这种魄力与目光，是令我们深为感佩的。

当今文学理论介入的领域实在太多，但是中心问题是文学理论中的“国际视域”与“中国问题”。我们本着过去表述过的主导、多样、鉴别、创新的原则，在国际视域、传统资源与中国问题的相互激荡中，推动与建设动态的、多样的文学理论的新形态，汇入我国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洪流之中。

钱中文

2013年6月

卷首语

这些年来，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而无所不包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于是，“理论终结”或“文论死亡”之“新说”应运而生。甚至于有急先锋向“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发难：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文论研究的空间”成为文论界同行十分关心热烈争鸣的一个话题。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文论研究是否真的已然终结？

在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之际，我们仍然有必要冷静地放眼世界。这并不是要迎合“全球化”大潮，与洋人“接轨”——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也不是为了什么“走向世界”——我们本来就在这世界上。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学的发育运行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

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现代国外文论，就应当看到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其互动性与共通性。所谓国外文论，就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

之分别。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的借鉴，多元素的吸纳，才有可能避免偏食与偏执。这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深化，尤为需要。

当代文学理论是在“跨文化”的状态中发育起来的，而具有“跨文化”的品格；今日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自觉地具有“跨文化”的视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也是一种必要；文学理论研究要突破单一国别甚至单一区域的局限。在不同国别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理论比较，将有助于“理论诗学”的建构。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落点还是文学理论。

比较以跨文化视界来进行，还是要落实到文学理论本身。

观照视野的开阔，是为了文论研究的深化。要恪守“文学/文论本位”。不能将这种比较泛化成“跨文学/跨文论的文化研究”。诚然，今日的文学/文论其内涵其界面已大大拓展，非昔日所能比，但核心命题并未消失。作家、作品、读者仍然是从“文学性”到“文学场”的种种文论研究难以回避的基本话题。比较要考虑“可比性”。分子水平上的“比较”，也许可以保障这种“可比性”。驻足于各种思潮的更迭各种主义的较量，很难进入深层的、有可能以互证互识而达致“会通”的比较，很难进入彼此并无影响可言也谈不上什么平行但却有精神理念上契合会通的“类型学”比较。对于一个比较学者而言，最具有诱惑力最具有价值的，也许正是这种比较，这种有可能去发现“隐于针锋栗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诗学“通律”的比较。自然，最具有诱惑力的，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比较并不是理由。比较诗学本身也并不是研究目标。为比较而比较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比较诗学应当是一种路径。通过它，可以走向理论诗学的深化；理论诗学建设可以也必须在比较诗学中进行。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与互动机制，决定了理论诗学的建构可以也必须在不同的诗学思想体系的对话与会通之中展开。

所谓理论诗学，就是以比较开阔的文化视界，就文学发育本身的基本环节上的理论展开理论性反思，以文学作品的结构肌理神韵、作家与读者的主体能量审美姿态创造机制接受方式、文学性与文学场的生成机理与互动形态这样一些诗学的核心命题上的理论积累，作为批判性审视的对象，对各种范式的文论所关注的

基本课题加以清理，在理论抽象的层面上，来寻求客观存在着的各民族文学所内在共通的“诗心”与“文心”。

这样的研究，是面对“大文论”的冲击而守护文学本位，而坚持文学本体研究；又是针对“小文论”的封闭而开拓理论空间，而开放理论视野，探索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之局限的文学理论，探索超越单个文化体系之上而具有一种世界性普遍解释力的文学理论。

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这样的构想也许不过又是一种“乌托邦”。但我们以为，文学学园地的耕耘，还是需要“乌托邦”情怀，需要一批有所开放而又有所恪守，有所解构而又有所建构的“乌托邦主义者”。

目 录

卷首语	(1)
-----------	-------

第一编 当代文学理论态势之反思

第一章 在反思中深化文学理论	
——“后理论时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问题	(3)
第二章 文学理论：“跨文化”抑或“跨文学”？	
——关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境况态势与发育路向的反思	(15)
第三章 反思中整合 梳理中建构	
——国外文学理论当下现状之检阅	(31)
第四章 “开放”与“恪守”，“解构”与“建构”	
——今日俄罗斯文论气象之手记	(46)
第五章 “复调”·“对话”·“狂欢化”之后与之外	
——当代中国巴赫金研究新进展	(76)

第二编 文学作品/文学文本理论之梳理

第一章 文学作品/文本理论与“文学性”之追问	(93)
第二章 作品理论/文本理论	
——当代文论发育的一种“年轮”	(105)
第三章 “开放的艺术作品”	
——埃科的作品观	(113)

第四章 “在对话中生成的文本”

——巴赫金的文本观 (128)

第五章 “作为意义生成器的艺术文本”

——洛特曼的文本观 (142)

第六章 “文本的生产性”

——克里斯特瓦的文本观 (170)

第三编 现代斯拉夫文论之旅

第一章 跨文化视界中的现代斯拉夫文论 (217)

第二章 捷克结构论学派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对接 (246)

第三章 “形式化” · “语义化” · “意向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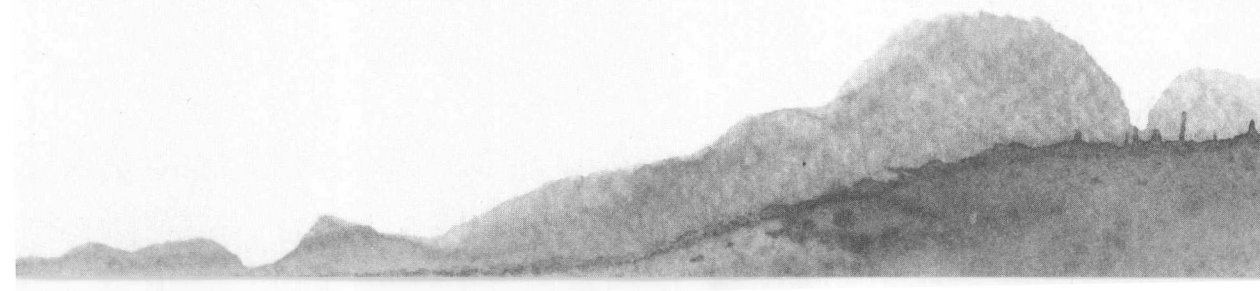
——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265)

第四章 当代外国文论：在跨学科中发育，在跨文化中旅行

——以雅各布森的文论探索为个案 (282)

后 记 (292)

第一编 当代文学理论态势之反思



第一章 在反思中深化文学理论

——“后理论时代”文论研究的一个问题

当下的文论界，“理论终结论”颇为流行颇有市场。“告别理论”已成为近年来我们文论界一些同仁的一种心态或一种姿态。这种情形个中缘由何在？可以将之归结为“理论的辉煌已然不再”。也可以对文论研究这一话语实践作一点反思。

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文论界的一些理论著述扩张越界随性代言，与文学研究本题渐行渐远，文学理论队伍中一些学者所言说的话题无所不及，过度越位，在泛文化批评的海洋中忘情流连。这一扩界与越位，是有负面效应的：一些人心目中，今日文论已经声名狼藉。这一现实，在滋生人们对当代文论的厌腻。这一解释不无道理。然而，一些人之所以要“告别理论”，恐怕还有一些别的缘由。其中之一，就是对文学理论已经没有期待：没有什么大的思潮，没有什么大的转向。思潮缺失，转向不见，似乎就是文学理论已然沉寂的症候，甚至是其寿终正寝的信号。这一心态，更在滋生人们对理论的失望。对理论的厌腻，对理论的失望，在形成一种合力，在产生一种“理论疲劳”。加上有大师俨然宣布“理论终结”，有大师的粉丝在传布“后理论时代”降临，一些人便与时俱进，而决意要“告别理论”，而迅速转向，进入“后理论”的新时代。

所谓“后理论时代”，自然有别于“理论时代”。一如“后现代”之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之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之于“殖民主义”。这里的前缀“后”，大概不仅意味着一种区隔，一种差异，一种否定；恐怕也意味着一种超越——自然是反思之后的超越，一种承续——自然是扬弃之后的承续，或者说，一种“延异”——那种既解构而又建构的“延异”。以这一视界来看，反思，反思文论界种种理论的流变，也反思我们的文论界理论研究的路径，或许也是一件颇有现实意义的话语实践。

要反思的问题不少。其中，“思潮”与“范式”的关系，“文本解读”与“理论建构”的关系，似乎比较紧要。通俗些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期待着“思潮”转向更替？为什么如此容易走向“文本”与“理论”之非此即彼？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用“思潮更替”来概括文学发展的进程，以“思潮斗争”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比如，现实主义的思潮与浪漫主义的思潮，现实主义的思潮与现代主义的思潮，现代主义的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等等。这种一分为二的划分，似乎不证自明而天经地义。我们的不少著述都在言说：过去整个一百年文艺学的发展不外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较量。这种概括是不是准确无误？我以为，这个一分为二的概括就值得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定式：不是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不是现代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不是科学主义就是人文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引领我们在进行具体的文学批评时习惯于一分为二地贴标签，在对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创作进行分析时习惯于以思潮论高下以“主义”分营垒。其实，这一框架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时候确乎差强人意。我们不太在意，文艺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而非社会科学。其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不能等量齐观。就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不一样，人文科学的研究方式、考量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都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地方。哲学上的一分为二和政治上的东风西风两分法，套用在人文科学上未必总能说得通。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者，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非此即彼的思潮较量框架，套用到文学研究中未必总能令人信服。

那么，怎样走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呢？应该看到，思潮还是处在现象层面的。“思潮论”是比较粗放而失之于简化的。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论研究，都应该透过一个个思潮——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去找到更深层次上支配这些思潮变换的基因，找到那种超越“思潮论”认知框架的理论视界。这，也许就是范式。

通观当代文学研究这一话语实践，至少有三种旨趣不同的基本范式。

第一种是解译范式。它关心作家述说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或再现了什么。这种范式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内涵，把文学看作“载道”的工具，突出的是文学的宣传、教化和认识功能，所谓“镜子”，所谓“兴、观、群、怨”。这种范式，至少包括社会学文论、心理学文论和精神分析文论。这种范式的旨趣，概括地说，就是追问作品文本写了什么。

第二种是解析范式。它关注故事是怎么讲的，而不是故事讲了些什么。这种范式倾心的是作品的审美方式与制作工艺，譬如，材料的加工，手法的运用，情节的编织，等等；它要解析文本如何表现、如何反映或如何再现，要解析作品的生成机制、结构方式、文学性的生成。它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自主的、自足的、自律的、自成系统的机体。这种范式的旨趣在于探析：文学作为一门话语艺术，其审美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所谓化“胸中之竹”为“纸上之竹”的过程是怎样的。这种范式，至少包括语义学文论、符号学文论和叙事学文论。

第三种是解说范式。它要探究的是：讲故事的人是谁，她/他为什么这样讲而不那样讲，她/他是在怎样的背景和场合中讲，也就是留意作品的“前文本”和“潜文本”。一方面，这种范式追问作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叙述的故事背后的动机、意图或客观效果是什么？另一方面，这种范式还关注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对作品的建构，即读者对文本可能有的种种解读。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解读都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种范式看来，文学文本是开放的，充满多方位对话的和多链环的语义场。从语言学上来讲，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的语用效果是不同的。从文学学来看，在这个范式里面我们就要讨论文本的“互文性”，关心“文学场”的生成、关注文学话语的权力效应。所谓“从一个文本甚至一个人物谈起，从一个故事甚至一个场景谈起”。20世纪后下叶，欧陆文论尤其是法国文论、英美文论尤其是美国文论流派林立，主义纷呈，“文学理论”扩张为“批评理论”，扩张为“理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一潮又一潮的女性主义文论，就是透过文学甚至是跨过文学的解说式文论。解说范式的文论多半已经不再驻足于文学文本，不再关心文学作品的审美维度，其兴趣焦点在于追究作者这样写、故事这样讲、讲故事的人的意图是什么，故事这样讲出来意味着什么。

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的这三种基本范式，在各个国家的发育很不平衡。以基本范式这一理论视界去考量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不难发现解译范式在我们这儿最为风光，社会学文论尤其很有市场。解译范式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本身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它恶性膨胀，独霸文坛，就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就会引领人们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一味地偏爱文学文本之历史文献、政治文献或心理文献、思想文献的价值；种种非文学专业的解译就会涉足文学批评、文论研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学”就会解体，就会泛化为一种公共领域；文学理论就会沦为一种“准文论”：历史学家可以做，社会学家可以